第一章

暗傷王化？

晚明司法與南京教案

方金平

引子

明神宗（朱翊鈞，1563–1620；1572–1620 在位）萬曆四十四年（1616），南京禮部侍郎沈淮（1624 卒）連上三疏控告耶穌會教眾「闖入都門，暗傷王化」，以求皇帝闢滅「邪黨」¹；同年，西教士王豐肅（Alfonso Vagnoni, 1566–1640）、謝務祿（Alvaro Semedo, 1585–1658）及一眾華人信徒被捕繫獄，是為「南京教案」。在各方拉扯之後，神宗下旨裁定教士「立教惑眾，蓄謀叵測」，將之盡逐國外，天主教淪為邪派，是為西教來華的首個教難而著於史。²教案之起，無疑為西洋宗教之衝擊中國傳統，亦係晚明黨爭之延伸。但此「教案」亦實事關刑獄，無論護教或反教，雙方之周旋往來並不單止在義理，而更在法律；其發生，推展以至終結，都藉由當時的司法程序所帶動。本章試圖指出案中兩造如何爭持於法律條文，探索法制在其中的作用與影響；並希望觀照晚明之司法與體制本身，說明其宗教與涉外面向。

提告：沈澹的御門指控

早在本案以前，耶穌會士之宣教言論已惹眾多士人不滿，引起不少爭議。在天主教來華之初，利瑪竇（Matteo Ricci, 1552–1610）雖然奉行「調適策略」（accommodation method），身穿儒服，以儒經說理，在尤其朝士間有顯著的成果。然而本於宗教原則，其對佛道始終多有抨擊，為不少儒生居士或僧人詰難。³其中以虞淳熙（1553–1621）堪稱最烈，亦係「破邪」先聲。⁴其作〈天主實義殺生辯〉及〈破利夷潛天罔世〉等篇，直斥天主創世無稽，西教「志將移國」，甚至有謂「夷之教一日不息，夷之書一日不焚，吾輩猶枕戈也」等語。⁵不過，正如查時傑所指，即使其時辯論言辭激忿，但雙方大體仍能理性對話，不見血腥亦可堪稱道。⁶萬曆四十年（1610）利瑪竇死後，意大利耶穌會士龍華民（Nicholas Longobardi, 1559–1654）繼任會督，一改利氏的穩健方針，進而向社會基層傳教，天主教在南京的一下子迅速擴張，又建教堂、闢花園，一時聲勢大開。南京為明廷陪都，係江南的政治及文化中心，如此鋪張就容易觸動保守士人的神經。⁷

其時晚明深重的政治衝突已在朝廷漫開。明中葉以來朝政積弊已多，亟待改革，然而萬曆朝的維新隨同首輔張居正（1525–1582）的去世卻舉步無前。政事日非之下，主張革新的東林黨人興起，同時激起以浙黨為首，力主保守的非東林派集結。自利氏來華傳教，與其多所往來的朝士，如徐光啟（1562–1633）、李之藻（1571–1630）等都務於改革，曹于汴（1558–1634）及鄒元標（1551–1624）等更是東林重臣。萬曆四十一年（1613），政風開明同時是利瑪竇摯友的首輔葉向高（1559–1627）致仕，由浙黨領袖方從哲（1628卒）繼位，朝廷的政治格局由此傾向保守。東林失勢而教案發生，據萬明所指，恐非偶然。⁸任職南部禮部的沈澹為浙江烏程人，同為浙黨，亦係閣揆方氏摯友。⁹其在親見天主教在南京的迅速擴展後，對天學已不再如前人般只着眼於學理教義，而更猜疑教士的意圖及其潛在影響。萬曆四十四年，沈氏終於將其攻勢推向司法，西教與中國朝士的衝突乃於焉變質，由學理爭執演成教案。其〈參遠夷疏〉，通篇實以刑律發議，係正式入稟朝廷的提告：

奏為遠夷闖入都門，暗傷王化，懇乞聖明申嚴律令，以正人心，以雅風俗……凡朝貢各國有名，其貢物有數，其應貢之期，給有勘合，職在主客司。其不係該戴，及無勘合者，則有越渡關津之律，有盤詰奸細之律。至於臣部職掌，尤嚴邪正之禁，一應左道亂正，佯修善事，扇惑人民者，分其首從，或絞或流。其軍民人等，不問來歷，窩藏接引，探聽境內事情者，或發邊充軍，或發口外為民，律至嚴矣……不謂近年以來，突有狡夷自遠而至，在京師則有龐迪峨、熊三拔等，在南京則有王豐肅、陽瑪諾等，其他省會各郡在在有之，自稱其國曰大西洋，自命其教曰天主教……臣初至南京，聞其聚有徒眾，營有室廬，即欲修明本部職掌，擒治驅逐。¹⁰

沈氏奏中，已是援引國法三條。所謂「越渡關津之律」即《大明律》兵律三〈關津〉章之「私越冒渡關津」一條，謂「凡無引文私渡關津者」犯禁。¹¹而「盤詰奸細之律」，則是同一章之「盤詰奸細」條，指「凡緣邊關塞，及腹裏地面，但有境內姦細，走透消息於外人，及境外姦細，入境內探聽事情者」有罪。¹²另外，尚有「佯修善事，扇惑人民」一款。此即《大明律》禮律一，〈祭祀〉章「禁止師巫邪術」條：

凡師巫假降邪神，書符呪水，扶鸞禱聖，自號端公、太保、師婆，及妄稱彌勒佛、白蓮社、明尊教、白雲宗等會，一應左道亂正之術，或隱藏圖像，燒香集眾，夜聚曉散，佯修善事，扇惑人民，為首者，絞。為從者，各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¹³

沈氏援引律典者三，直奏皇帝，已是大興刑獄之勢。其所謂「私越關津」或「盤詰奸細」尚係針對教士的個別行為；然而「師巫邪術」則直指天主教本身——傳揚左道，煽惑群眾，圖謀不軌，如若成立，即可將整派宗教連根拔起，事關最為重大。然則，明代之世，何謂「邪術」？

「邪教」？明代律法中的邪術

《大明律》及附例中的相關的宗教管理條文，可謂由元末明初的政治局勢而生。眾所周知，明太祖（朱元璋，1328–1398；1368–1398在位）之建國立業，借明教及白蓮教等力甚多。事實上，民間領袖借宗教神話起事本來就司空見慣。條文所列「彌勒佛、白蓮社、明尊教、白雲宗等會」，名目雖異，但自宋元以來早已合流，均傳誦彌勒降生或明王轉世，帶領世人重建光明世道的傳說，因此多為起事所援用，唐代以來均遭歷朝政府頒令禁絕，但一直以來禁不勝禁，在元末更成為漢民反抗蒙元的重要精神依據。如其時曾雄據一方的韓山童（1351卒）即為白蓮教首，其子韓林兒（1340–1366）也自號小明王；明祖及後建國號為「明」，亦在呼應時下明王轉世的傳說。¹⁴ 因之，明代建政後，朝廷一直嚴防宗教事變。早在明律頒定之前的洪武三年（1370），太祖就已頒〈禁淫祠制〉劃定君臣百姓的祭祀原則：

朕思天地造化，能生萬物而不言，故命人君代理之。前代不察乎此，聽民人祀天地祈禱無所不至。普天之下民庶繁多，一日之間祈天者不知其幾，瀆禮僭分，莫大於斯。古者天子祭天地，諸侯祭山川，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，其民間合祭之神，禮部其定議頒降，違者罪之。¹⁵

簡言之，明祖意在匡正臣民的祭祀秩序，以求各有所尚，互不踰矩。天地山川固然不是邪神，然而卻係天子諸侯所司，百姓不應僭越。祭祀雖為敬拜神明，卻仍需合乎人間的權力軌範。及後中書省即據此擬定法規：

凡民庶祭先祖，歲除祀竈鄉村，春秋祈土穀之神，凡有災患，禱於祖先。若鄉屬、邑屬、郡屬之祭，則里社郡縣自舉之，其僧道建齋設醮，不許章奏上表，投拜青詞，亦不許塑畫天神地祇。及白蓮社、明尊教、白雲宗、巫覡、扶鸞、禱聖、書符、呪水諸術並加禁止，庶幾左道不興，民無惑志。¹⁶

從此，按詔令而言，人民除了祭拜祖先，春秋祈求土穀豐收等，不得有其他祭祀活動。鄉邑郡界所屬，亦應各有代表負責；至於在元末流行，宣揚彌勒化生、明王轉世，鼓動群眾另立新主的白蓮教、明教之類，自然是魅惑民人的「左道」，需加禁止。此一後半部分，後來亦化成明律的「禁止師巫邪術」一條。明乎此，沈淮另再指控教士「私越關津」、「盤詰奸細」以及「闖入都門，暗傷王化」都絕非無的放矢，而是試圖將其描繪為陰謀聚眾、圖謀造反的「邪教」。正如田海（Barend J. ter Haar）所指，白蓮教自從在明代入律成為邪術代表，在士人及大眾心目中幾乎只剩下負面形象，明代以來眾多官方所希望打壓的異教或宗教勢力，都紛紛被打為白蓮教或與其相關、相似，天主教只是其中一例。¹⁷ 沈氏等反教力量的舉措，在晚明的脈絡下，實在自然不過。

交鋒：雙方的攻守爭持

因此，根據法律條文的設定，反教勢力的攻擊策略已定。北京禮科給事中余懋孳（1617卒）、南京禮部祭祀司郎中徐如珂（1562–1626）等亦都參奏西教。¹⁸ 時稱「南北禮卿參之，北科道參之，而南卿寺等巡視等衙門，各有論疏」。¹⁹ 反教之爭，沸沸揚揚。另一方面，本在天津屯田的徐光啟，則稱病癒，回京復職，並於七月上〈辯學章疏〉再行力抗反教派之攻擊。²⁰ 綜其沈淮等人後續之反教言論，着墨於「越渡關津」及「盤詰奸細」兩項指控已然不多，而都更着力於指控天主教士聚眾不軌。如下列余懋孳所疏，不但如前述沈氏般作相類攻擊，其言辭更是驚駭：

自大西洋利瑪竇入貢而中國復有天主之教，不意留都王豐肅、陽瑪諾等煽惑百姓不下萬人，朔望朝拜動以千計。夫通夷有禁，左道有禁，使其處南中者夜聚曉散，效白蓮教之尤，則左道之誅何可貸也？使其資往偵來，通濠鏡吞夷之謀，則通番之戮何可後也？故今日解散黨類，嚴防關津，誠防微之大計。²¹

在余疏之中，天主教聚眾已不下萬數，動以千計，聲勢聳動非常；且明指西教效白蓮之尤，不可不察，其甚至連結澳門聚合的葡萄牙人，稱其大有內外夾擊之勢，正威脅明廷。如此演繹，西教士於南京的傳教活動，自然更是潛伏重地，居心叵測了。沈氏的〈再參遠夷疏〉又稱：

王豐肅等潛住南京，其盤詰勾連之狀尤為駭恨……城內住房既據洪武岡王地，而城外又有花園壹所，正在孝陵衛之前……狡夷伏藏於此，意欲何為乎？²²

同時又進一步沿西教聚眾不軌的思路續稱：

豐肅神姦……起蓋無樑殿，懸設胡像，誑誘惑民。從其教者，每人與銀三兩，盡寫其家人口生年日月，云有咒術，後有呼召，不約而至。²³

可見反教派之各方論疏，戰線實在劃一，都在力圖將天主教行狀勾勒成律文所指的邪教，以能援引國法，打擊政敵。法律規範竟主宰了宗教論爭的焦點。受到攻擊的護教派，也被迫繼續在法理上周旋。龐迪我及熊三拔之揭帖，則沿反教派的相反邏輯，極力說明西教並無叛逆意圖。對於以銀兩聚眾一事，龐文就稱：

南京從教者，既有萬人。每人與銀三兩，是用過銀三萬銀。不論接濟，燒煉其銀兩藥物，皆須三十餘拾，曾有何人見此搬運？萬人之中，有貧有富。富者非三金可動……貧者不足給其用，必求多用，盡必求繼。不多不繼，必生怨，不等必生妒怨，怨與妒皆能使之漏言，此亦情勢之必然者。²⁴

龐氏反駁，可謂簡明有力。而對於「咒術呼召，不約而至，此則民間歌謠所傳遍者」，龐氏重申天主教義亦禁咒術，並提出嚴查歌謠來歷，如果係王豐肅所為，則依律治罪，否則該反坐誣害者。如此，更是以法論法：

符咒邪術，正惡魔所為，誘人入於大惡，陷於永殃者，乃教中第一大戒。西土道人，從來遊行諸國，闡正闢邪，專與此輩為敵仇耳……有此歌謠似宜抑即刻拘執其人，研審來歷，查核其真跡。果係的確豐肅等當依律治罪，或押發本國明正典刑；若其無之，其造作歌謠，熒惑人心者，亦應反坐，律有明條，恐不宜漫然而已也。

最後，關於營室洪武岡及孝陵一點，龐揭則反駁指，若洪武岡為龍脈所在而成禁地，則何以素來往來稠密，萬家所居？何況所買之地本為工部舊官房，不過荒廢年久，無人承買才人棄我取，當中更有「文契存證」。²⁵而所謂孝陵衛花園，則本是住民舊地，後由王豐肅買下以作為菜田，離孝陵甚遠，絕非潛住禁域，別有用心。²⁶

判決：明神宗的「聖裁」

儘管教士辯駁有據，然而雙方之角力並非對等，因為反教派似乎已封鎖教士言路，前引龐迪我、熊三拔之揭帖，可能根本未正式上達御前。龐氏等在揭文稱，被反教派參奏以後，曾即往通政司投書陳情，但「奔走累月，未蒙奏進」，乃有此揭帖。²⁷與此同時，依謝務祿之說，其時教會會督龍華民亦有上奏朝廷，不過也無法上達，因此謝氏深信沈淮等反教派已控制北京言路。²⁸雖然謝氏之說或憑臆斷，但若云反教派要安插親信於通政司阻截教士上奏，亦不無可能。²⁹總之，歸結龐迪我與龍華民之挫折，至少肯定教士上書確有困難。如是則身受參奏的各個教士，卻竟然無法親身辯白。事實上，前述之揭文亦未肯定是否有循正常途徑上達天聽，因為考之《明實錄》與《萬曆起居注》，均未見神宗閱覽龐揭之記載，也未見其對揭文的御批。³⁰既然成效未卜，於是教士就反其道而行，將揭文刊刻，然後於京師廣發，試圖製造輿論，以公眾熱議引起神宗注意。³¹但無論如何，護教派始終沒有穩當的申辯渠道。

不過，即使反教派干預言路，其指控亦一直未佔上風。自沈淮在四十四年五月發難以來，神宗對反教之士的奏章一概留中不發，

不置可否——唯獨徐光啟所上的〈辯學章疏〉卻得到御批「知道了」的回覆。³²然而，徐氏之疏遠不及龐揭有力，只能泛論西教導人向善，並無邪念，並強調其認識眾教士多年，深信教會絕無不軌企圖，但對沈氏辛辣的刑律指控無一條能正面回應。³³事實上，徐光啟本身甚至不清楚何以有教案發生。其家書謂：「西洋先生被南北禮部參論，不知所由」、「遽云細作，此等何事？待住處十七年方言之？」³⁴可見徐氏對於龍華民改變教會策略，以及沈氏與反教派的圖謀可能一無所知。因此，徐氏只能就事件議一處置之法：着地方官府密切監視天主教眾可有失德違法之舉，再行論斷其是否邪教，「誰是誰非，孰損孰益，久久自明」。³⁵雖然唯有徐光啟得到御批回覆，但神宗亦不過擱下反教奏疏，始終不曾降片言旨意說明該如何了斷。³⁶於是，反教派先下手為強，由北京禮部下令先行逮捕王豐肅、謝務祿等教士歸案。³⁷可是一直至是年十二月，神宗仍然置之不理。於是，沈氏又再上奏，是為〈參遠夷三疏〉，催迫神宗表態；南京禮科給事中晏文輝（1598年進士）亦上疏促神宗批決，但俱不得要領。³⁸最後，或許是首輔閣臣發揮關鍵影響。是月二十五日，首輔方從哲與閣臣吳道南（1623卒）再參西教，請旨速賜答覆。³⁹神宗終於在三日後，十二月二十八日降旨：⁴⁰

王豐肅等立教惑眾，蓄謀叵測，可遞送廣東撫按，督令西歸。其龐迪我等，禮部曾言曉知曆法，請與各官推演七政，且係向化來，亦令歸還本國。⁴¹

神宗聖旨，即是終審判決，教士「師巫邪術」。由此罪成，天主教被裁定為「邪教」。神宗之判決經過幾番延宕，詔中卻無清楚交代依據，背後考量今已難考。不過觀乎其判刑當中，只簡單回應將本案的教士「督令西歸」，西教如何「蓄謀叵測」並未釐清，今後要如何處理天主宗教、西教士「蓄養」的信眾要如何對治等大問題均未有言明，神宗並未認真要清剿天主教，似乎只希望了結事件，但求息事寧人。

行刑：化外人的法外開恩

神宗降旨以後，本案即進入了定罪和量刑階段。有明之司法制度，本設有多重覆審程序，以避免誣告枉屈。尋常案件，必須由州縣初審，再由府、按覆核，甚至須經督撫預聞；案情重大者，則尚須中央三法司，即刑部、都察院及大理寺等會審，而皇帝則掌握終審權力。然而，由於本案一開始即上告御前，並由神宗聖旨定罪，因此其後之審核，都在「師巫邪術」罪成的前提下進行。其查考之處，不過在有否牽涉其他罪名，以及刑罰的衡量與執行。雖然本案事關政治鬥爭，亦已由皇帝定罪，但其餘細節，尚要經一整套法律程序處理。首先，本案由於涉及外國人，而其審訊、量刑與行刑都有所不同。明律有關規定，可見〈名例律〉當中「化外之人有犯」一條：

凡化外之人有犯，並依律擬斷。⁴²

此可謂明代法律對待外國人的原則性條文。⁴³然而，雖謂「依律擬斷」，但在實行上，化外人往往有各種另類安排。明代宗（朱祁鈺，1428–1457，1449–1457 在位）景泰五年（1454），據御史姚哲所奏而定的「遠人犯罪律」就規定：「各省遇蠻夷人有犯，若係真犯死罪，依律處斷；笞、杖罪的決，發還本部族。」⁴⁴如是則死罪以下之過犯，由其本國處置，但罪行的判準仍依明律。執行上，不能對化外人發配充軍，而流罪以下俱准以納鈔代刑，然後驅逐出境。⁴⁵既然處置不一，在本案，則須先確認涉案之王豐肅及謝務祿是否果為「化外人」。禮部主客清吏司職司朝貢各國使節之接待，並明其禁令，於是就由該司主理本案。⁴⁶教士化外人之身份，亦由其驗明。⁴⁷然後，清吏司會同司務廳、祭祠司、精膳司、儀制司等會審王豐肅及謝務祿，審明其個人身世背景、如何入境、來華目的和在華行誼，以及有否共犯等。⁴⁸理清案情以後，即咨南京都察院查照，然後奉聖旨諭，交五城巡視御史衙門，遞送廣東撫按。⁴⁹送抵廣東後，教士又經廣東布政使、按察使及都指揮使三司會同譯審，再查清案情，然後方被押往澳門，遣返西洋。其中過程仍需再向南京都察院彙報。⁵⁰可見過程細緻嚴謹，絕不馬虎。